

先唐哀祭文体研究

哀祭
先唐

XIANTANG AIJIWENTI YANJIU

○ 王一涵 著



卷十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光緒皇帝文牘研究

光緒皇帝御筆 1861-1908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王慶雲 著

光緒皇帝御筆 1861-19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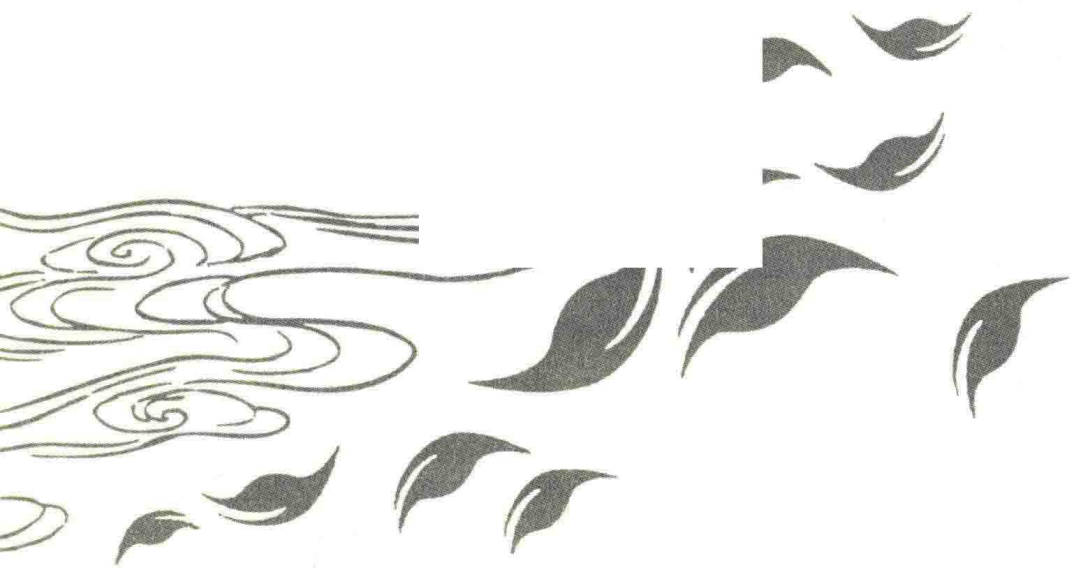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
(批准号11&ZD103) 阶段性成果

先唐哀祭文体研究



XIANTANG AIJIWENTI YANJIU

○ 王一涵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唐哀祭文体研究 / 王一涵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117 - 3422 - 8

I. ①先…

II. ①王…

III. ①祭文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2960 号

先唐哀祭文体研究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66509618

目 录

绪 论	1
一、古代文体分类	1
二、古人对哀祭文体的认识和分类	9
三、哀祭文体研究现状	15
四、研究范围和方法	24
第一章 古代丧祭思想	28
第一节 儒家的死亡观念	28
一、早期社会的死亡观念	28
二、儒家的生命意识	32
三、“三年之丧”的理论与实践	34
四、儒家对死亡的超越	37
第二节 道家和道教的死亡观念	38
一、老子的死亡观念与顺应生死的“道”	39
二、庄子的死亡观念与“生死齐一”	41
三、道教理论中的“重生恶死”观念	43
四、道家和道教对死亡的超越	45
第三节 佛教的死亡观念	48
一、佛教的“死亡之苦”	48
二、佛教的死亡观念	50
三、佛教对死亡的超越	52
第四节 结语	55

第二章 古代丧祭仪式	56
第一节 古代丧祭礼仪	56
一、儒家丧祭礼仪	60
二、道教丧祭礼仪	80
三、佛教丧祭礼仪	85
第二节 丧祭仪式的意义	93
一、“过渡礼仪”与“阈限”理论	94
二、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	96
三、丧祭礼仪的文化功能	102
四、仪式与文体的产生	112
第三节 结语	114
第三章 诔文研究	115
第一节 诔文溯源	115
一、诔之释义	115
二、诔与谥制	117
三、诔的礼制规定	121
四、诔文体制溯源	123
第二节 诔文流变	127
一、内容的变化	127
二、抒情方式的变化	131
三、诔主身份的变化	138
四、体制的变化	142
五、流变的原因	150
第三节 诔文的衰落	155
一、谥议与行状对诔文作谥职能的取代	157
二、碑志文对诔文述德职能的取代	161
三、祭文和哀辞对诔文写哀职能的取代	164
四、佛教丧葬愿文对诔文祈愿职能的取代	165

第四节 结语	168
第四章 祭文吊文研究	169
第一节 祭文溯源	169
一、祭之释义	169
二、祭与祝官	171
三、祭的礼制规定	173
四、祭文体制溯源	178
第二节 祭文流变	181
一、体制的仪式性特征	181
二、内容的变化	182
三、祭主身份的变化	188
四、语体形式的变化	191
第三节 吊文溯源	193
一、吊之释义	193
二、吊与凶礼	195
三、吊与宾礼	198
四、吊文体制溯源	200
第四节 吊文流变	202
一、吊文的文体定型	202
二、内容的变化	203
三、体式的变化	207
四、体制的变化	209
第五节 结语	211
第五章 哀辞、哀策、挽歌研究	212
第一节 哀辞溯源	212
一、哀辞释义	212
二、哀辞溯源	213

第二节 哀辞流变	215
一、哀辞的文体定型	215
二、哀辞的体制特征	216
三、哀主身份的变化	220
四、哀辞抒情方式的变化	224
第三节 哀策溯源	225
一、哀策释义	225
二、哀策文体溯源和礼制规定	226
第四节 哀策流变	228
一、哀策的文体定型	228
二、哀策的文体结构与体制特征	229
三、哀策的文体流变规律	232
第五节 挽歌溯源	235
一、挽歌释义	235
二、挽歌与送终之礼	238
三、挽歌仪式的表演者——挽郎	243
四、“非礼”的助乐挽歌	245
第六节 挽歌诗流变	247
一、挽歌与挽歌诗	247
二、葬礼挽歌诗和拟挽歌诗	250
三、献赠挽歌诗	255
四、挽歌诗的文体流变规律	257
第七节 结语	261
 第六章 丧葬文书研究	 262
第一节 买地券研究	262
一、买地券的产生	263
一、买地券的仪式性特征	264
三、买地券的体制	267

四、买地券的内容	269
第二节 镇墓文研究	272
一、镇墓文的产生	273
二、镇墓文的仪式性特征	275
三、镇墓文的体制与内容	276
第三节 告地策研究	281
一、告地策的产生	281
二、告地策的内容	283
三、告地策与通关之“传”	284
第四节 丧葬文书与道教思想	286
一、丧葬文书与道教神仙谱系	287
二、丧葬文书中的解除内容	292
三、丧葬文书中的道教符箓内容	296
第五节 结语	300
参考文献	301
后 记	311

绪论

一、古代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关于文体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渊源已久，一直受到历代学者们的重视。最早的文体辨析思想可以上溯到《诗经》，风、雅、颂就是按照某种标准试图对诗歌进行分类的。《尚书》中的文章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名目，也是一种对文辞的分类。《左传》更是直接载有多种古代文体名目，如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先秦其他典籍中也保留有一些文体的名目，如《周礼》中的“大祝作六辞”，有祠、命、诰、会、祷、谏等六种文体类型，《周易》中的卦论和爻辞中也保留了论、说、辞、序等文体雏形。考察先秦时期出现的文体分类，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体辨析不是以辨析文体为出发点的专门分类，而是出于实际政治生活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早期社会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生成大量具有实用性的社会行为，而相伴而生的言辞是作为社会功能行为的组成部分出现的，随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技巧逐渐增强，包容着大量社会功能行为的言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行为意义也发生了转化，文体观念逐渐孕育。

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虽然刘向、刘歆父子的原作已经亡佚，但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七略》的概况，还是可以看出“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的分类原则。《诗赋略》中分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为

①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页。

四家，分为屈原赋类、陆贾赋类、孙卿赋类、客主赋类；歌诗为一家，共五种。他们的文献分类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意识的萌生。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蔡邕的《独断》是最早的文体学研究专著。^①《独断》始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其中所列的文体分为皇帝发布的诏书和大臣呈递的奏章两种，皆是处理朝政大事时使用的文类，共有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章、奏、表、驳议八种文体，“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反数百事”^②，一一说明其体式和用途。与蔡邕同时代的刘熙编著的《释名》，也是一部考释事物名称兼及文体名实辨析的著作，《释名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③《释名》卷6《释书契第十九》和《释典艺第二十》中，训释了奏、檄、谒、符、传、券、策书、启、书、告、表、诗、赋、诏书、论、赞、铭、碑等文体，其中涉及的对文体名称及其内涵、外延的考辨，体现出鲜明的辨体意识，但是，“这种辨体意识更多地指向遵循文体功能进行文章写作，即如何因体作文或作文得体，而不是指向以篇归类的类别区分，因此尚属于文体形态学的范畴”^④。

范晔的《后汉书》在《文苑传》和其他诸列传中详细著录了各位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如：“（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⑤“蔡邕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海》《叙乐》《女训》

① 刘跃进：“从现存资料来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最早。”参见《〈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5）；张方：“以此为准，后汉蔡邕或可成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创导之人。”参见《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② [宋]王应麟：《玉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1。

③ [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序言第1页。

④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⑤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0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6页。

《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①《后汉书》在著录传主的文辞著述的传记资料中，一共著录了六十二种文体的名称，《后汉书》这种从“有韵之文”到“无韵之笔”的著录次序，表现出从汉末开始至“文笔之分”的文体辨析观念已经趋于明朗。^②

由建安开始，中国文学逐渐进入自觉的时代，也带来文学观念的自觉和文体分类意识的渐趋鲜明。而古人的文体思想主要体现在文章结集和编撰总集中。

南朝梁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萧统“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共选录了东周到南朝梁八百年间的诗文七百余篇，共涉及作者一百三十余人。《文选》中选录的诗文分为三十九类文体，综观《文选》中这些文体顺序的排列，是有一定规律的，郭英德老师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总结了《文选序》中文体序列的体类排序规律：“按照文体的语体区别（文笔之分），遵循先文后笔的原则；按照文体先后出现的时间顺序，遵循先源后流的原则；按照文体所体现的行为方式的空间秩序，遵循先公后私、先君主后臣下、先朝廷后地方的原则；按照文体所体现的社会功能排序，遵循先生后死的原则；按照文体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遵循先雅后俗的原则。”^③这里的文体序列观念虽然处于非自觉的状态，却在后代的总集类文体排序中具有示范效应。萧统在划分出赋、诗等文体的一级类目之外，又细分出了二级类目，如赋之下另设十五个子目，有京都、纪行、游览、宫殿、物色、鸟兽、哀伤、音乐、郊祀、畋猎等；诗之下另设二十三个子目，有述德、公宴、咏史、游仙、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军戎、乐府、挽歌、杂歌等，大体是根据题材类型加以区分的。对此《文选序》中有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各以类分，类分之中，以时代相次。”^④《文选》所进行的文体辨析分类，使当时流传的许多文章皆有

①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卷60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6—2007页。

②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③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④ [南朝·梁] 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类可依，而且呈现出不同文体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体制形态的差异性，对后世的文体论和文体分类学影响深远。

唐代之后编选的文章总集层出不穷，基本效法《文选》按文体编排的方式依类收文。如北宋初年李昉等人编撰的《文苑英华》，就将文体分为三十八类，共一千卷。姚铉在《文苑英华》基础上又精编《唐文粹》，所选作品按文体分为古赋、古调、颂、赞、表奏书疏、状、檄、碑、铭、箴、诫等二十二大类，各类下又分子目三百一十六类，共一百卷。《唐文粹》之后，又有南宋吕祖谦的《宋文鉴》，按文体分为六十一类，共一百五十卷；元代苏天爵编《元文类》共七十卷，按文体分为四十三类；明代程敏政编《明文衡》共九十八卷，按文体分为三十八类，这些都是断代选录的总集。

元代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分正、续集各二十卷，独辟蹊径地将所选诗文仅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①，而每一门类中又包含若干种文体，真正在分类思维上对以往文学总集的文体辨析观念加以突破。这种文体分类方式从文体自身的语言表现入手，同时也顾及古代文体的功用性质，其分类已经与近现代文体的叙事、抒情、议论的分类方法相类似。

明代的文体分类更加细致，吴讷编《文章辨体》分内外两集，内集五十卷，外集五卷，将文体分为五十九类，虽然是一部总集，重点却在辨析各类文体上，对各种文体的性质、流变进行梳理研究。稍后，徐师曾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文体明辨》八十四卷，将文体广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并对每种文体的来龙去脉和体式特征进行辨析归纳，可以说是明以前的文体论的集大成之作。虽然这两部书中的文体分类过于细碎，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为“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也”^②，但两

① [元]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谈到自己的文体分类思想：“辞命”一门包括告、令、诏、策、玺书、敕书、问策等文体，多见于朝廷所用的政府公文，皆为“王言”或臣子“代言”之作；“议论”一门包括疏、对策、奏、对、封事、谏、论、上书、议、表、书、奏记、原、说、读、对问、杂记、解、辨、赞、序等文体，是“发于君臣会聚之间”，或者“见于师友切磋之际”；“叙事”一门包括传、碑、神道碑铭、庙碑、墓志铭、状、记、序等文体；“诗赋”一门包括诗、骚、赋、箴、铭、颂、赞、郊庙乐歌、琴操等文体。

②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书都以推源溯流为主，还讨论了各种文体的具体作法和体制特点，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各种文体的格式、语体和体貌做了总结性的论述。

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共分为二十六卷，三门十一类文体。该书突破了《文选》以来总集中不收录经、史、子的传统惯例，从文章的表达性质着眼，将记叙性文体、应用性文体和表情达意性文体分别归为“著述门”“告语门”和“记载门”，其中“著述门”包括论著类（著作之无韵者）、词赋类（著作之有韵者）、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告语门”包括诏令类（上告下者）、奏议类（下告上者）、书牋类（同辈相告者）、哀祭类（人告于鬼神者）；“记载门”包括传志（所以记人者）、叙记（所以记事者）、典志（所以记政典者）、杂记（所以记杂事类）。

古人的文体思想除了在文章结集和编撰总集中展现，有时还通过作者在历代文论中直接评述展现文体思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按文体划分为四科八体，归纳出不同的文体特征、体制、风格，并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在中国文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而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狂”的著名观点。陆机对文体的“十分法”，基本承袭曹丕的以文体的体貌特征为依据来分类，但对文体的分类来说，是从文体性质和文体体貌两方面加以界定的，比曹丕的分类标准更细致和深入。而且陆机的文体分类方法将诗、赋等纯文学文体置于文体序列的前列，而将铭、诔、奏、议等实用性的文体排在后面，透露了诗、赋的审美特质被确认并已成为“文”的主流形式这一信息。^①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文章流别集》的理论部分，将所收文章作品按照文体加以区分，同时还对每种文体的特征做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并谈及各种文体的源流与演变过程。今存佚文中论及的文体就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范围十分广泛。如：“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

① 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① 这里就着重论述了哀辞文体的功用和体类，而不仅仅是考察其产生的渊源。

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是一部专门探讨文体起源的文体论专著。该书大约收录了秦汉以来所有文体的名目，其文体分类之全、之细可谓前无古人。《文章缘起》包含八十四种文体。虽然该书的分类非常完备，但是却存在主文类与次文类并列而论的问题，致使诸文体的名目在类分序列上显得繁杂而缺乏逻辑性。

《文心雕龙》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论，在文体分类学、文体源流论、文体发展史、文体风格学以及文体体制论等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刘勰以从《明诗》至《书记》大约五分之二的篇幅详述了各种文体及其子类，根据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统计^②，共涉及七十八种文体：有韵之“文”分为赋、颂、祝、铭、箴、诔、哀、吊、谐；无韵之“笔”分为诸子、论、诏、檄、封禅、章、奏、议、书。除此之外，刘勰还对相近似的文体加以辨析，以便人们更清晰地把握不同文体的风格特点，如《颂赞》中有云：“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诫之域。”^③ 这就将颂与赋、铭加以区别，颂与赋不等于浮夸，又与铭不同于劝诫。刘勰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④ 的文体辨析的基本方法，真正使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趋于完善和系统化。

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也对文体的起源进行了解释，认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并将文体分为五大类：生于《书》者诏命、策檄，生于《易》者序述、论议，生于《诗》者歌咏、赋颂，生于《礼》者祭祀、哀诔，生于《春秋》者书奏、箴铭。颜之推的文体观念代表了从南北朝到隋

① 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页。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③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④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4页。

唐的文体过渡思想。其后如唐魏徵《隋书·经籍四·集志叙》、宋郑樵《通志·草木昆虫略·序》以及各种诗话文话中都分别对不同文体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零星散见的评论也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但都没有超过《文心雕龙》的价值。

关于古代文体的分类问题，黄侃先生有云：“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收以简驭繁之功。”^① 叙述了由于中国古代文体数量庞杂而带来的分类上的困难。纵观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发展，在秦汉时期，文体还处在产生阶段，没有形成自觉的文体分类意识；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文体种类越来越多，文体划分也越来越细。而当文体的发育逐渐成熟后，容易互相混淆，这就需要辨析文体，根据文体之间的共同之处进行归纳综合，需要明晰文体的界限，并对前人过于琐碎的分类进行新的综合。

姚鼐受到前人分门系类等文体辨析观念的启发，有感于前代文体分类的繁杂，在编选《古文辞类纂》时以简驭繁，将相似的文体归为十三类，一类之中如果涉及较大的区别，则又分为上下两编。其卷首的《序目》中，简要地叙述了各类文体的源流、特点，并谈到其归纳原则：“其类十三，曰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② 这里所说的“为用”就是姚鼐文体分类的标准，即以文体的功用划分大类。中国古代每一种文体都萌发于特定的历史土壤，在相匹配的固定历史语境中，具有独特的功能用途。考察古代的文体命名我们会发现，古人在从事某一种文体创作的时候并非事先将该文体的名称和体式等因素规划清楚，而是在日常交际中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并达到某种功用才相应地创作某种言辞并逐渐完善，最后固定为特定的体貌和样式。郭英德老师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讲道：“文体分类的社会性特征深深地蕴藏于文体的文本方式之

①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② 〔清〕姚鼐、王先谦编：《正续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中，并由文体独特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得以彰显。”^① 所以，“源于功用是文体生成的最基本方式，由此也对该文体的体制风格产生直接影响，进而成为类分文体的主要参照”^②。早在刘熙的《释名》中我们就发现文体的解释是与其现实的社会功能相联系的：“诂，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③ “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④ “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⑤ “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⑥ 应用性文体自不必说，甚至诗和赋这一类的抒情性文体的产生也是有着实用性需要的，由此，古代的各种文体都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以社会功能为依据对文章进行分类归纳也是文体分类的重要体式和原则。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以“为用”为标准对文体进行功用性的划分，就是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提出来的“原始以表末”的文体研究准则，不为“名实所惑”，对每一种文体的渊源和演变进行分析，随后再提出文体辨析的理由，在深入把握文体功用特征的基础上才做出文体的判断。如：“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功颂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做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琊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其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圻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⑦ 在分析碑志文体的渊源和流变之后，具体界定其文体身份。除此之外，《古文辞类纂》在具体的文体辨析中，也是遵循从文体功用出发的

①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 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页。

③ 〔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8页。

④ 〔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3页。

⑤ 〔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6页。

⑥ 〔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3页。

⑦ 〔清〕姚鼐、王先谦编：《正续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